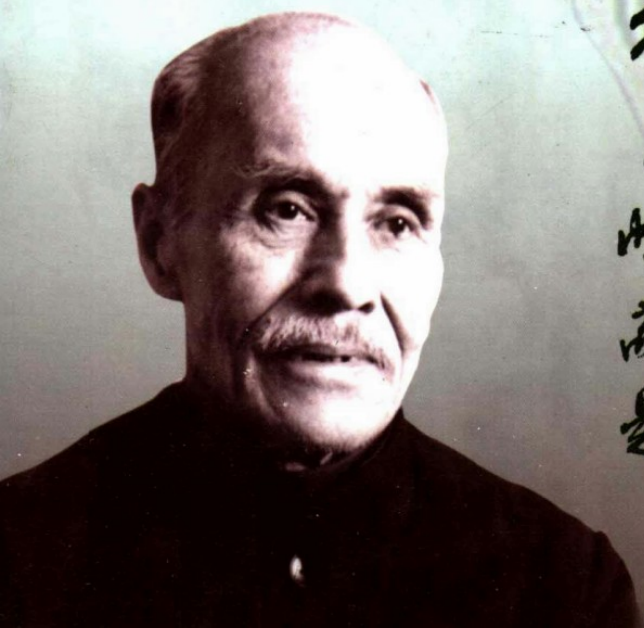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葉 每 戲 之 集

程
子
帆
敬
題



黄天骥 陈寿楠 编

董每戡

文集

上卷

浙江图书馆藏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董每戡文集 (上卷) / 黄天骥, 陈寿楠编. — 广州: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 1999.8

ISBN 7-5361-2344-2

I. 董… II. ①黄…②陈… III. 文学理论 - 文集 IV. 1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6031 号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 广州市林和西横路 邮编: 510075 电话: 020-87550735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高发印务公司排版

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22.25 印张 8 插页 550 千字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2000 册

定价: 60.00 元

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题词

先生之風山

高水長

賀

董每戡先生方集出版

弟子

季羨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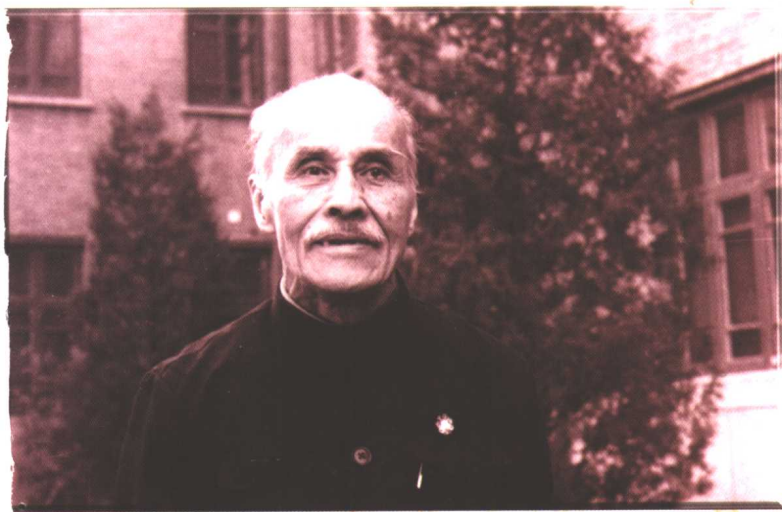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九八年十月



董每戡50岁留影（1957年）

1951年董每戡与夫人胡蒂子
于长沙湖南大学



1979年在北京出席全国四届文代会的董每戡

黑柳：家函已接，三台東南行，今日又接你信，宜
傳雅只有戲劇一武系，口頭和標語完全無用，中
共軍隊首領都知道這一點，只是不肯出相肯口說
去談話，有許多眼非不到人天經費過去繼續發展，
去之上面也保存中國事業的發展，守劇評的陳志
目証付反數理自問題，沒有把握，胡等也未曾
尚未定，非的應聘書雖在，被金陸二公便美
了，喜拿去，實際的未留到月末始能決定。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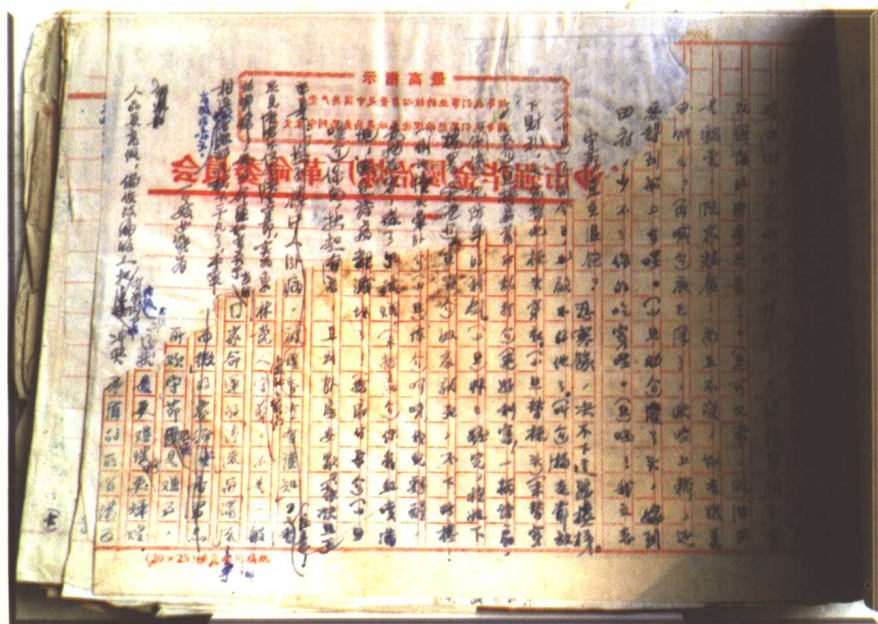
李健

李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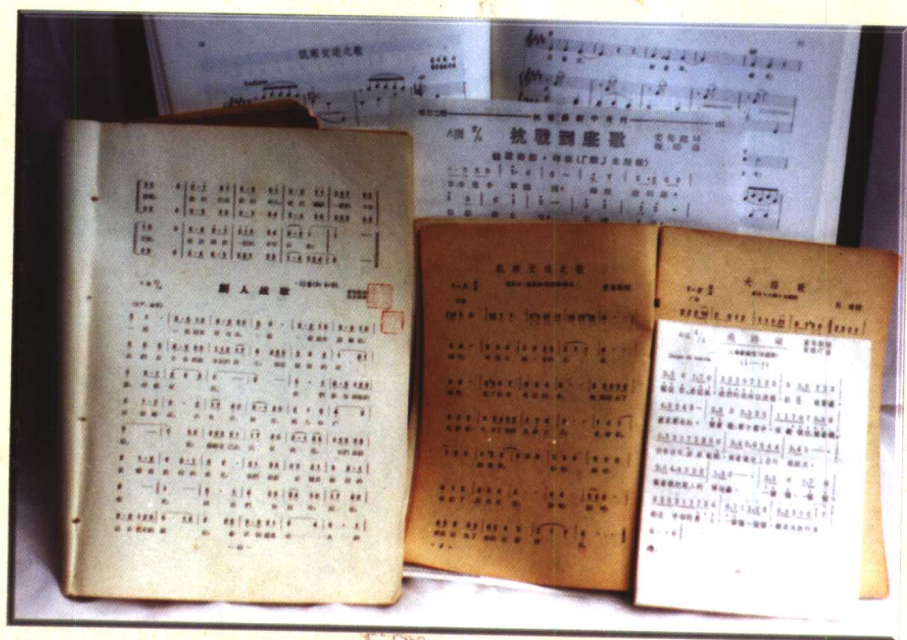
十三



被老鼠咬坏后经修补的残稿



被老鼠咬坏后经修补的《五大名剧论》手稿



董每戡与聂耳、冼星海、贺绿汀、张曙等音乐名家合作的抗战歌曲

前 记

黄天骥

董每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和戏曲史研究专家。他生于1907年，浙江温州人。原名董华，曾用名杨大元、杨每戡，又曾以每戡、戈力士、丐丐为笔名。早年在温州教会举办的艺文中学读书，192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，在瞿秋白的影响教育下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事变后，董先生受党指派，回到家乡温州，开展农民运动。不久，上级机关被破坏，董先生身份暴露，被国民党政府通缉。他便离开温州，潜赴上海，化名杨大元，从事戏剧活动。这期间，他创作了独幕剧《频伽》、童话剧《给我们需要的》、小说《鼻涕阿媛的梦》等。这些作品，锋芒锐利，显示出董先生进步的思想倾向。

在上海期间，董先生和鲁迅有所接触。据卢礼阳和朱正先生记述，董先生于上海避难时，与金溟若开办时代书局。金先生翻译了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论文集，董先生便和他一起拜访鲁迅。鲁迅帮助金让译稿逐期在《奔流》刊出。后来金抽鸦片成瘾，翻译中断。鲁迅从董先生那里打听到有关情况，怫然不悦。可见，

董先生和鲁迅会有过多次的交往。^①

1928年底，董先生东渡日本，在东京日本大学文学院攻读戏剧。1929年底回国，参加左翼文化大同盟。1931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，投身于进步的文艺运动之中。

在“左翼剧联”，董先生被编进理论工作组，和宋之的、章珉等一道工作。当时，艺术界一些人鼓吹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言论，剧联理论工作组正拟开展批判。刚好上海“美专”中的剧联成员赵丹、徐韬、王为一等，为筹备该校校庆演出活动，向组织要求剧本，董先生便给他们写了三幕剧《C夫人肖像》。据赵铭彝先生回忆：“我把报刊的一些文艺谬论，特别是几个在美专当教授的许多文句摘录给他，然后把剧情结构商定，不到三天，每戡就写了一个三幕剧。我们看了，觉得妙极了。”^②这个戏，由赵丹主演，郑君里导演，于1931年11月由美专剧团首次演出，随即轰动剧坛。那时，鲁迅得到董先生请郁达夫转交的戏票，应邀往观，深深赞许。这段日子，董先生还写了《饥饿线上》、《夜》、《黑暗中的人》、《血液出卖者》、《典妻》等剧，他关注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，为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奋声疾呼。

抗战期间，董先生在湖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，通过种种戏剧活动，宣传抗日。在长沙，他任“一致剧社”的社长兼编导，创作并导演了三幕剧《敌》。据董先生回忆，“这个戏，后来又多次演出，都取得成功，给满怀抗战热忱的戏剧青年以莫大的激励。”^③后来，他应田汉之邀，前赴武汉，加入由郭沫若领导的

① 参看卢礼阳《董每戡和鲁迅的交往》，载《瓯海文史资料》第四辑，1991年7月。

② 《悼董每戡同志》，载1980年3月22日《羊城晚报》。

③ 见《温州进步戏剧史料集》，第六七三页。

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六处戏剧科。不久，第三厅奉命撤退，董先生也随队西徙。在成都、贵阳，他先后担任航空委员会直属的“神鹰剧团”和贵州省教育厅戏剧施教队的编导，创作了《神鹰第一曲》、《孪生弟兄》、《俘虏》、《孤岛夜曲》、《未死的人》、《该为谁做工》、《最后的吼声》、《保卫领空》、《天罗地网》、《秦淮星火》、《杜玉梅》等独幕剧和多幕剧。这些剧作，全以抗战为题材。董先生讴歌抗日的战士，鞭挞侵略者和卖国贼。他充满激情，呼唤群众保卫国土。

在西南，董先生一方面活跃在戏剧创作领域，一方面和侯枫、李束丝、田禽等自费创办《戏剧战线》月刊，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以鲜明的爱国进步立场发表言论，受到文坛瞩目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写下大量戏剧评论文章和散文，为繁荣戏剧创作大声疾呼，也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抗战时期文坛活动的珍贵史料。

1943年秋天，董先生应陆侃如先生之邀，到了四川省三台县，在内迁到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授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他先后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、上海剧专、大夏大学等校任教授，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。从担任教学工作开始，董先生便致力于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的研究工作，《中国戏剧简史》、《西洋戏剧简史》、《西洋诗歌简史》以及《说剧》，就是他在这一阶段结合教学作出的研究成果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董先生曾任湖南大学教授、省文化局戏改会副主任委员。1953年，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。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后，回到长沙。“四人帮”垮台，中山大学落实政策，派人把董先生接回。岂料不到一年，董先生便于1980年2月13日溘然病逝，终年七十三岁。

二

解放初，社会安定，气氛宽松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。董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，努力工作，意气风发。他除了给学生讲授中国戏剧史、外国文学史等课程外，课余时间，还指导学生排演话剧，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如何分析剧本，懂得处理演员与角色的矛盾。他又积极参与广东省的戏曲改革工作，为促进粤、潮、琼、汉等地方剧种的发展不遗余力；另外，还出版了《琵琶记简论》和《三国演义试论》两部专著。由于董先生在学科科研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1956年，他与容庚、商承祚、詹安泰先生一起，被评为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得高教二级工资的教授。

董先生热爱祖国，衷心拥护党的领导。1957年初，浙江师院夏承焘教授来穗讲学，董先生咏词言志，有句云：“壮心未已，握手言欢今日好；各有心期，报国还凭笔一枝”。从青年时代开始，董先生便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奔走呐喊，当能安下心来从事文化和教育建设时，更是热切地期许以笔报效国家。这年春天，党中央号召“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”，鼓励知识分子讲真话，提意见，董先生给北京的俞平伯先生去信，还寄去《贺新郎》一词：

莫负屠龙手，髭星星壮怀未老，热肠如旧。健笔尚存应自许，文苑犹堪驰骤，况又值争鸣时候。转眼春来花齐放，好江山万里铺锦绣，生盛世，恨何有？
红楼旧梦还重究，更无妨，从容定论，夜随清昼。今日爱才非昔日，珍惜儒林老宿，劝莫学金人缄口。地北天南常怀想，献芜词能获同心否？希赐覆，正纡缪。

董先生是全心全意地拥护“双百”方针的。他担心俞平伯先

生曾因《红楼梦研究》一书受过批判，心有余悸，便恳切地向他诉说自己的体会，认为党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劝俞先生响应党的号召。在今天看来，董先生当年对大鸣大放的想法，未免过于天真。但是，他确实是怀着一片热忱，以为既然党中央发出号召，知识分子就不应有所保留，而应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认为和党肝胆相照，才是真正的爱党爱国。

1957年夏天，董先生在一个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，被某领导邀请发言。过了不久，风云突变，董先生被划为“极右分子”，沉沦在惊心动魄的运动之中。要知道，学者们多有逞才傲物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弱点，何况以为“治病救人”、“言者无罪”，岂料会被打翻在地！当时，董先生苦闷彷徨，十分困惑。1957年秋末，他在致陈寅恪、詹安泰两位先生的诗中写道：“书生积习总难忘，酒后常疏戒履霜；长日空怀心耿耿，连霄深悔视茫茫。浮名已被多言误，大错宁成致命伤；枕上排愁歌代哭，群蛙声里起彷徨。”确实，一夜之间，以言入罪，这是几十年跟随党的爱国者所万万想不到的。

1957年后，董先生回到董师母胡蒂子家乡长沙定居。从1958年至1979年，悠悠廿载，生活极其艰苦。可是，决心“报国还凭笔一枝”的董先生，却排除万难，一直坚持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。他右手病颤，穷得买不起稿纸，却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写出书稿二百多万字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书稿被抄走，被老鼠咬掉，他又凭记忆重新补写。

董先生在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锲而不舍地工作，他的勤奋和刻苦，乃是忠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，忠于祖国文化学术事业的表现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品质。过去，屈原见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史迁被谤，乃著《史记》；董先生穷厄著书，不正是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品德么！他们以铮铮铁骨，撑持着中华文化。

最使董先生痛惜的，是他那些用心血浇铸而成的书稿被抄走。他有诗云：

一箱论稿十箱书，珍护何曾饱蠹鱼；

病手推成文百万，无端野火付焚如。

这首诗是在1966年秋天写的。董先生说：“突失书稿，痛惜不已。忽忆白居易‘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’之句，转觉泰然，一笑置之。”诗中所谓“病手推成”，是指为克服手颤，写文章时以右手横握笔杆，而以左手推动笔尖书写。现在我们看到《文集》中的几本论著，像《五大名剧论》、《三国演义试论》（增改本），就是他在失稿后凭记忆重新“推成”的。

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董先生一直坚信，他的报国理想终归能够实现：“述作雄心未肯灰，多年伏枥待春回。”这信念支持着他，使他坚忍不拔地度过了漫漫长夜。当时，深居穷巷的他，时刻关注国家的命运。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，他写诗哀悼，盛赞总理“为国忧勤数十年”。“四人帮”倒台，董先生知道祖国命运即将发生重大变化，也预感自己的命运和国运连在一起，否极泰来。1976年11月，他赋诗云：“人生七十童年始，今后应多少壮时；整顿旧鞍旧辔蹬，冲锋陷阵再擎旗”。那一年，董老师正好七十岁，他养精蓄锐，准备迎接学术的春天。

1979年5月，董先生从湖南回到了中山大学。他十分兴奋，一再高吟“老来应了平生愿，再吐胸中剧史篇”；“自珍笔底留奇气，彩笔精描未了生。”行装甫卸，他便把精力用于科研教学，连续撰写了论文多篇。那年夏天，广东省戏剧家协会邀请他发表演讲。时光和苦难没有磨蚀这位老人的词锋，他侃侃而谈，思路清晰，议论精辟，使听者赞叹不已。到冬天，他应邀赴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。当时拨乱反正，形势大好，董先生对未来充满信心，还准备写一部反映解放后新中国戏剧发展的专著，名为《新华铺绣录》。可惜，这部书还未动笔，董先生猝而离开人世。